

《論語》與青年

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日青年學藝講座講辭

蘇文揮

各位：

我今天以《論語》為講題，是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顧問容宜燕先生給我指定的。回顧二十年間，我曾在大會堂為孔聖堂主講全部《論語》，用的是逐章逐句串講法。又曾在中文大學間歇地開課，用的是分類選講法。又曾在中大校外課程開講“《論語》提綱”，用的是專題歸納法。也會在香港電台播講“讀《論語》的三易三難”，是重點分析法。由於講座不斷提供我溫習機會，我深深地體會到《論語》是一本入情入理而又有趣，人人可懂的書；又是一本“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”，非專門名家不能盡懂的書。所以朱子從六歲開始讀《論語》，一直到七十歲瀕死之前也在研究、在修改他的《論語或問》。它豎盡古今，橫通中外，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支柱；是世界人文思想的巨著。五十年代美國大學圖書館，調查世界十大名著，《論語》以其譯本之多流行之廣僅次於《聖經》而居其次（《老子》譯本雖多但流行不及《論語》）。日本學者林泰輔在所著《論語年譜》中，搜載古今中西有關書籍逾三千種。近年台灣嚴靈峯先生出版《論語集成》，搜載歷代註本凡二百四十八種。當然，也不是全數，從上述文化的累積量來看，足證它不愧為世界第一奇書，二千年來，一直閃爍着人類智慧的光芒，發掘了人性的尊嚴與深遠。所以從漢代起，自天子至於平民，由幼學至於壯老，早已家絃戶誦。可惜進入本世紀以來，先之以五四時代廢經倒孔，繼之以大陸十多年所謂文化大革命，進而瘋狂批孔。如今，事過情遷，《論語》本身價值，自然絲毫無損。但此種歪風邪說，對年青一代所加於孔子與《論語》的無知與歪曲，情況仍然是相當嚴重。所以我今天的講題，暫且談不上《論語》中較高層次的哲理和學術性，而試圖從新一代的角度，對《論語》所應該急切認知的，提出下列三點，時間所限，恐怕說得很不完備。

第一：有人一直誤解孔子教人崇拜偶像，以為《論語》中，孔子說話全是自我權威。多年前，我親耳聽到一位在教育界頗有地位的人物，在一次大學教學研討會上，竟然公開說孔門中全是子曰子曰，造成舊式教育中先生講學生聽和學生不肯發問的原因，我們此刻不暇去討論，在教育原理上，“先生講、學生聽”究竟有甚麼不好？而學生之不肯發問，是否和《論語》有關？而是嘆息於此種人對《論語》的無知到了如此地步。因此我們對《論語》二字，先要作一明確而具體的解釋。“直言曰言，論難曰語。”這是

《毛詩傳》、鄭氏《周禮注》、和《說文》的共同訓解。其中“語”字，已包含了互相討論和答問兩層意思。所以《漢書藝文志》說：“《論語》者，孔子應答弟子時人，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。”“應答”和“相與言”正是“語”的雙重含義。這一直訓法，本來已說明了一萬三千七百字的《論語》，是經過孔門師弟共同討論的遺留。再從《論語》二字實質來看，我發現“論”和“語”正是周代行政教育制度的專有名詞。古代教育，其目的為培養公卿大夫。故曰“學而優則仕”。從學成到出仕，要經過層級的人材評審，就叫做“論”。《大戴禮·文王官人篇》列舉了國家銓叙法，有所謂六徵（《逸周書》作六徵）、九用、七屬，而歸結到：“三戒然後及論，王親受之而後論成。”論成的過程又怎樣呢？《禮記·王制》說：“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，司徒論選士之秀者，升之學曰俊士。”又說：“司馬論辨官材，論進士之賢者，以告於王而定其論，論定而後官之，任官而後祿之。”鄭注云：“考其德行道藝為論。”這是人材的全般考察，其作用一如隋唐以後科舉取士和現在層級學位考試，而更為完備。孔門承接著王官失守而為私人教育，孔子有德無位，弟子學成之後，不能保證一定受官，但在學習過程，經常討論到每個人的性情、才德、學能，以備時用。試看《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》（《先進》），他們分別以治軍、理財、外交、儀注自信；當孟武伯問子路、冉有、公西華有沒有仁德時，孔子只告以“治其賦”，“可使為宰”和“可使與賓客言”（《公冶長》）；季康子問仲由、冉求、子貢可否從政，孔子告以“由也果，求也藝，賜也達。”（《雍也》）至於同門互相評論的，例如曾子稱許顏淵“以能問於不能”（《泰伯》），子游曾子評論“吾友張也難與並為仁”（《子張》），子貢曾問孔子“賜與回也孰愈？”（《公冶長》），又曾問及“師與商也孰賢？”（《先進》）。這都不是信口去議論人長短，而是結合於嚴肅的人材評審來進行的。至於書中涉及古人時人一百四十章，而專論古今人物者四十八章。乃屬於“見賢思齊，見不賢而內自省”（《里仁》）的以人為鑑。又從“官人定論”方法轉化為“論人修身”，其政治性不強，而教育之功能特大了。至於“語”字，更是周代庠序教學和選才之法。《學記》說：“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，必也其聽語乎。”為師要聽語，有類老師主持學生小組導修。又《文王世子篇》有：“養老、乞言、合語之禮”。合語是共同討論，有類於今日之研討會。又有“語說命乞言”，“語說”有類於今日之專題演講。又《周禮·大司樂》以樂語教國子，所謂樂語，包括興、道、諷、誦、語、言六種活動。凡上述之聽語、合語、語說、樂語等等，都含有討論、問答和演講，絕不會由一個人從頭到尾說下去的。因而《論語》中標題“子曰”的有二百五十章，佔全書四百八十章之半數以上，其中固多孔子所直言，亦必有師徒討論所得之結論。一則古人言多稱師，二則文字極簡，故紀錄者畧其研討之過程，而以結論歸之於孔子。陳澧《東塾讀書記》說：“《論語》記聖人之言，有但記其要語，其餘刪節之者，以此推之，如‘君子不器’、‘有教無類’，四字為章，何太簡乎！必有節去之語矣。”這是很有啟發性的說法。再看孔門四科設教，也從“語”的制度而來。《文王世子篇》說：“凡語於郊者，必選賢斂才焉，或以德進（德行），或以事舉（政事），或以言揚（言語），曲藝（文學）皆誓之，以待又語。”郊為周朝大學之一，他們通過一個龐大的討論演講會來審定

人才，就以上述四科作為範圍。而杏壇學制，全仿周官，亦可見凡屬“子曰”的篇章，也不能完全看作孔子個人的發言了。明白了上述《論語》的直訓和實質，那裏有甚麼偶像權威？那有完全是“先生講，學生聽”？青年人如果多讀《論語》，才真正懂得如何“切問近思”，如何“時而後言”了。

其次，我常常遺憾於魯迅先生以文學奇才，古書也讀過不少，而對《論語》存心戲弄。見於《孔乙己》小說中“君子固窮”和“君子多乎哉”等句足資證明，至於是否藉‘孔乙己’一名來醜化孔子，不必深究。但此種無聊筆墨，實為中國文化自瀆之羞。尤其在《現代中國的孔夫子》一文中說：“見過孔子畫像，他從來不笑，非常威風凜凜，假使在他旁邊侍坐，一定把腰骨挺得筆直，骨節酸痛。”又以為“中國人對孔子是恭謹而不親密。”我明白魯迅所描述，是指後世迂儒所僵化了的孔子，但這言不由衷之詞，青少年學生，先入為主，以為當真是孔子的形象，這是危險的錯誤了。如能稍讀《論語》，便知道孔子的真相，日本兒島獻吉郎曾指出一點，大意說：“老子用智而薄於情，墨子用智而矯於情，孔子用智而深於情。”我還要補上一句，佛祖也是從大慈大悲有情眾生進入，但當他提昇到如來淨境之後，轉令人有酷不入情之感。只有從《論語》中所透射出來的孔子，永遠平易近情而約之以禮（禮即理也），合乎《中庸》“喜、怒、哀、樂發而中節謂之和”。《論語》全書只有一個怒字，是贊賞顏淵不遷怒的，其餘喜字五見，哀字六見，惟有樂字十五見，所以我常說，《論語》從哲理層次說是“仁書”，從社會層次說是“人書”，從情緒教育說是“樂書”。開卷學而時習之“悅”，有朋自遠方來的“樂”，《先進》記閔子、子路、冉有、子貢四人侍側，情態不同，全投入“子樂”感受之中，即使疏食飲水，曲肱而枕，同樣樂在其中（《述而》）；甚至子畏於匡，在陳絕糧，仍是“子歌吾和”、“絃歌於室”（二事分見《韓詩外傳》及《莊子》，《論語》未載）；至於弟子描述對老師的感受，一則說：“子溫而厲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”（《述而》）；再則說：“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。”（《子張》）；以如此情態中和之人，怎會“威風凜凜。令侍坐之人骨節酸痛”呢？再看伯牛有疾，孔子自牖執其手，慨嘆於斯人斯疾（《雍也》）；顏淵死，子哭之慟（《先進》）；子路死，哭之中庭（見《禮記檀弓》）。又嘗說“回也視予猶父”（《先進》）；又說“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”（《述而》）。孟子記孔子歿，門人心喪廬墓三年，又舉七十子之服孔子為心說誠服。以如此敬愛之情，又怎會令人“恭謹而不親密”呢？我常常覺得現代青年，不難於追求外在知識，而難於處理內在的性情。由於缺少了聖哲風範的熏陶，或則衝動暴戾，流為憤怒；或則矜誇自大，流為狂妄（《論語》所謂暴、慢）；或則色取行違，流於虛鄙；或則消極悲觀，流於頹廢（《論語》所謂鄙、倍）；能夠從《論語》中快樂積極的人生中和的情緒來教育自己，是最有效而幸福的。朱子常提到呂伯恭年少氣盛，遇事好爭，一日讀“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，則遠怨矣。”（《衛靈公》），自此終身無暴怒。台灣趙龍文先生曾以《論語今釋》著名，他在一篇《我為什麼喜歡讀論語》一文中，自述中學時在日記中記下了和一位好同學反目互毆的情形，給父親看了，批下了幾句：“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；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”（《顏淵》），才敬佩於聖人能洞透人情，而加以辨

惑，從此畢生誦習《論語》。由上述種種事例看來，可知《論語》不是板起面孔來說教，而以其平易近情直接透入人類心靈的底蘊。

第三；我又常怪胡適之先生在哲學史中妄斷：“孔子為守舊派人物，其教育造成了幾千年的書生廢物。”於是不少淺薄之徒，以為孔子信而好古，不求新進；只是喜歡老成，疏遠後生。不少無知青年一聽到《論語》，便以為是老古董，以為只有老人家，上一代才可以信受，這是非愚則妄的。我要分兩點來說明：第一：孔子誠然篤信好古，但同時“好古敏求”。求甚麼？求新知！求創見！《論語》“新”字雖然只有三見，但一句“溫故而知新”，已給吾人以莫大的啓示。何況《大學》開篇論新民，《湯盤銘》以日新垂訓。孔子學而不厭，就是不甘於故步自封。出現於書中的論仁、論禮、論政、論君子、論天命，都經過孔子思辨篤行而注以新的內涵，顯然與西周以來說法有異。（這些都可以作專題來講述的）故在七十三年歲月中，日新之境，見於“吾十有五而志於學”一章（《為政》），至為具體，其他《易》學由神道天道轉化入人道，《春秋》由魯史轉化為一王褒貶之法，文章由口語化的記錄轉為文言，全是思想學術上的新變；不在《論語》之內，也就不詳述了。第二：孔子不特不是一位迂腐頑固的老人，而永遠是一位活潑風趣接近青年的長者，書中出現三位童子：一是《述而篇》之互鄉童子，二是《憲問篇》之闕黨童子，孔子都加以接待和教導。三是《子罕篇》之達巷黨人，考據家以為即是有名的七歲為聖人師的項橐。（項橐見《戰國策秦策》及《淮南子務脩訓》），孔子曾請教他若干問題，他說：“大哉孔子，博學而無所成名。”似乎寓貶於褒。孔子聽了，“謂門弟子曰：吾何執？執射乎？執御乎？吾執御矣。”這種對有智識的青少年人的尊重和親切，非有寬裕溫柔之愛，不能表現得如此自然。還有一點更為重要，孔門弟子和孔子年齡差距，見於《史記》仲尼弟子傳的廿三人，平均少孔子卅六歲。見於《孔子家語》的卅一人，平均少孔子卅七歲。從紀錄中看，少十歲以內的只有三、四人（如秦丕茲少四歲，顏淵少六歲，子路少九歲），年差最大的達五十歲。試以四科十哲為代表來看：

顏淵少三十	閔子騫少十五	冉伯牛少七歲	
仲弓少廿九	宰我無紀錄	子貢少卅一	
冉有少廿九	季路少九歲	子游少四十五	子夏少四十

平均年差亦廿七歲，他如傳道的曾子少四十六、明禮的子張少四十八，以相禮見稱的公西華少四十二。於此我們得到兩點認識：一、從孔子對青少年一般熱誠，和感染的深度，反映孔子一定是活潑而有朝氣，才易為少年人所歡迎。二、從弟子們以兒子對父親、孫子對爺爺的年齡差距而能長期共同生活學習，互敬互愛而互助，匡邑被圍時，顏淵才廿五歲，子貢才廿四。在陳絕糧時，子游僅十五，子夏僅十六，以如此年齡，能和老師同甘共苦，這在今天看來，很值得吾人肅然起敬，瞿然自省了。所以孔子曾說：“後生可畏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。”（《子罕》）；而對一位放蕩無禮的原壤，卻罵他：“幼而不遜弟，長而無述焉；老而不死，是為賊。”（《憲問》）。從兩章對照來看，誰還敢懷疑孔子在無原則之下尊重老人而輕視少年呢？近世從西方吹過來一股代溝的邪風，我們正擔心香港青少年易患敏感症與傳染病，對症下藥，惟有及時多讀《論語》，對“老

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”（《公冶長》），一定得到一個填平代溝的方法。

明白了上述三點，當會明白二千年來論語所以為兒童初學入德必讀之書的原因，也是學者哲人所畢生求知求行的目標。可惜這一路向迷失了大半個世紀。去年四月間，臺灣省教育廳明令國民中學每周以一小時講讀《論語》，希望三年之內選讀完畢。同年十一月曲阜舉行孔子討論會，重新頌揚萬世師表的貢獻。這必然要通過誦習《論語》，才有實質的意義。這是不是意味到文化復興的初機？我不敢說。但相對地香港的中學教材卻從八〇年起，連以前僅有二十篇之一的《里仁篇》也莫名其妙的刪去了，因而我今天提出正確地認識《論語》，或者不算是合時宜吧！